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26 年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4, No. 2 (2026)

浮动的“东方”：
粤港澳水上餐厅的历史、空间与文化政治

吴栩同*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

漂浮于粤港澳水域的仿古画舫式水上餐厅，是理解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之权力运作的独特经验场域。本文以香港珍宝王国（珍宝海鲜舫、太白海鲜舫、海角皇宫）、澳门皇宫船、珠海得月舫与广州龙门海鲜舫六艘水上餐厅为案例，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为主轴，整合萨义德东方主义批判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构建“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三维分析框架。核心研究问题为：水上餐厅的“东方性”如何通过空间生产被构想、物质化与体验？研究发现，水上餐厅的“东方性”并非建筑风格的自然属性，而是一套经由命名编码、仿古建筑、影像叙事、停泊定位与日常运营持续生产的文化表征，但其生成机制在不同制度语境中存在根本差异。香港案例以殖民旅游想象与华人资本自我东方化双重逻辑为主导，澳门案例以博彩资本对“东方”符号的工具化征用为特征，内地案例则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营与地方地标建设逻辑为驱动，东方主义框架对其适用性需作限定性调整。沉没、闲置、复业、拆除六艘船只的命运差异本质上是不同空间生产条件、资本积累模式与制度性语境的物质投射。“浮动”不仅指向实体层面的水上停泊状态，永不稳定、持续漂移、始终处于意义争夺之中，更构成一种文化身份的隐喻。本文为理解“东方”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空间维度的物质性案例，也为空间生产理论拓展了水上浮动空间这一独特经验场域。

关键词：水上餐厅、空间生产、东方主义、文化政治、集体记忆、粤港澳

* 吴栩同，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电邮：taipa1553@163.com

Floating “Orient”: History, Space,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Floating Restaurant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Area

Wu Xut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ntique-style floating restaurant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Area constitute a distinctive empirical field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dynamics embedded in spati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aking six floating restaurant vessels across three jurisdictions as its cases, the Jumbo Kingdom group in Hong Kong (Jumbo Floating Restaurant, Tai Pak Floating Restaurant, and Sea Palace Floating Restaurant), the Macau Palace, the Zhuhai Deyue Fang, and the Guangzhou Longmen Floating Restaurant and deploying Henri Lefebvre’s triadic dialectic of spatial production as its analytical axis, integrated with Edward Said’s critique of Orientalism and Maurice Halbwachs’s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spatial practice, and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se floating structures as social spa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rientalness” of these floating restaurants is not an inherent attribute of their architectural style, but rather a set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continuously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through naming conventions, pseudo-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cinematic imagery, mooring siting, and everyday operations. Their generation depends on the triadic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the conception in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the materialization in spatial practice, and the contestation over meaning in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The divergent fates of the six vessels, sinking, idling, reopening, and demolition are essentially material projections of differing spatial production conditions, mod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Floating” here denotes not merely a physical state of being moored on water, but also serves as a metaphor for a cultural identity that is perpetually unstable, continuously drifting, and permanently immersed in struggles over mea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floating restaurants demonstrate that onc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cquire material form through spatial production, they become objects of contestation between power and capital; their ultimate semantic fate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can remain anchored within shifting conditions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offers a spatially grounded material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Orient,” while also extending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into the distinctive empirical domain of floating waterborne spaces.

Keywords: floating restaurants, spatial production, Orientalism, cultural politics, collective memory,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Area

一、引言：一艘船的沉没何以成为文化事件

2022 年 6 月，停泊于香港仔避风塘逾四十六年的珍宝海鲜舫在拖往东南亚途中沉没南海，引发广泛关注。香港媒体连续数日占据头版，社交媒体上“人离乡贱，船离港沉”的民间格言被反复引用，有评论者将其比作“香港人的铁达尼号”。这一反响表明，珍宝海鲜舫所承载的象征意义远非一艘商业船只的价值所能解释。它同时是“东方风情”的视觉符号、香港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全球旅游想象的具体锚点，是一个被持续生产的社会空间与文化表征。珍宝并非孤例，太白海鲜舫（1950—），香港第一艘现代海鲜舫，2020 年停业后正在分阶段复业；海角皇宫（1957—），1998 年售往菲律宾，2011 年赠予青岛后闲置至今；澳门皇宫船（1962—2007），前身为“珠江画舫”，以“浮动赌场”形式运营四十五年后停业，目前处于更新活化阶段；珠海得月舫（1993—2020），填海建造，停业待改造；广州龙门海鲜舫（1985—1990），因趸船超期服役拆除。这六艘船横跨四地、历时七十余年，命运殊异，构成一组值得系统考察的案例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水上餐厅的“东方性”如何通过空间生产被构想、物质化与体验？这一核心问题可分解为三个相互嵌套、逐层推进的次级追问。第一，在空间表征层面，“东方”如何被命名、建筑编码与影像叙事所构想？第二，在空间实践层面，这一构想如何通过停泊、迁移与日常运营被物质化？第三，在表征空间层面，沉没、闲置、复业、拆除等不同案例的命运差异如何从空间生产条件、资本逻辑与制度语境的差异中得到解释？三个次级追问分别对应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的三个维度，构成从“生产”到“物质化”再到“命运分化”的完整分析链条。在展开论证之前，需要对本文的三个核心概念“东方性”“空间生产”与“浮动”作出明确界定。“东方性”在本文中并非一个本质化的文化属性，而是一个分析性范畴，指涉一套通过命名、建筑、影像与日常实践被反复生产的意义系统。本文区分了三种不同机制的“东方性”生产，殖民时期由西方知识体系建构的“作为他者的东方性”、后殖民时期由华人资本主动调用的“作为消费符号的东方性”、以及地方社群在亲历中体验的“作为情感载体的东方性”。三者并非彼此取代的线性关系，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案例中以不同比例交织运作。“空间生产”取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的三元辩证法含义，即空间表征（构想）、空间实践（物质化）与表征空间（体验）三重维度的持续互动。“浮动”则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物理层面的水上停泊状态、文化层面的身份混杂与漂移、政治层面的意义争夺。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主轴，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批判视角，辅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追问：这些漂浮于粤港澳水域的仿古画舫，其“东方性”从何而来？它们的建造、停泊、迁移与沉没，与“东方”这一文化表征的空间生产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四地六船的不同命运如何从空间生产条件与制度语境的差异中得到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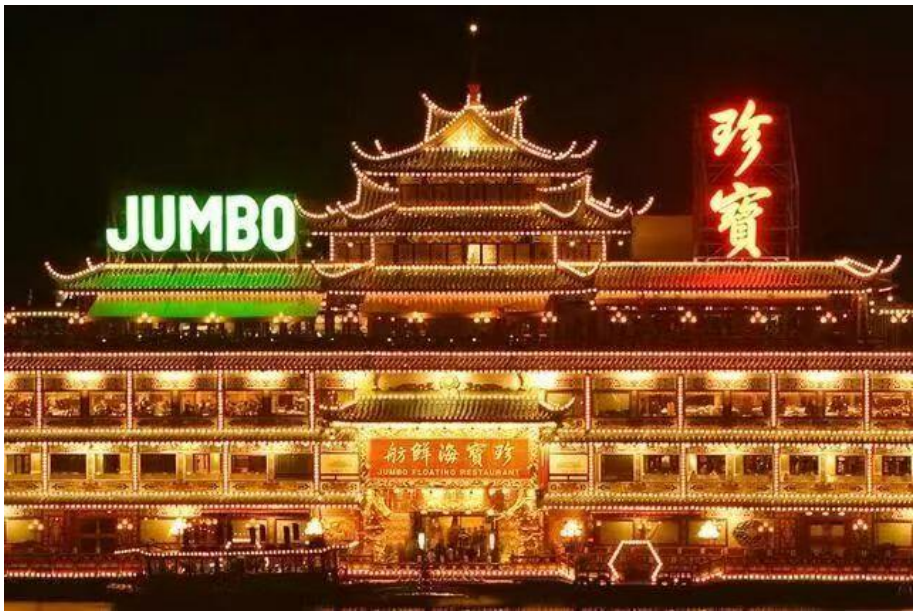

图 1：香港珍宝海鲜舫

二、理论视野：空间、东方与记忆

要理解水上餐厅这一社会文化空间，单一理论视角不足以揭示其多重面向。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主轴，结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层层递进的分析框架。列斐伏尔提供理解空间之社会性的本体论基础，萨义德揭示空间生产为何指向“东方”这一特定方向，哈布瓦赫则将空间与时间、物质与意义联结起来，使空间分析获得历史纵深。

需要首先界定的是，本文所使用的“东方”及“东方性”概念并非一个单一的、同质的范畴，而是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分层辨析。第一层是殖民时期西方知识体系建构的“作为他者的东方”即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揭示的那套由学术、文学与艺术共同生产的、服务于西方认知支配与殖民扩张的话语系统。在这一层面，“东方”是被书写的、被凝视的、被本质化的对象。第二层是后殖民/全球化时期由华人资本主动调用和再造的“作为消费符号的东方”即何鸿燊等华人企业家在经营水上餐厅时主动征用“中国风”建筑符号，将其转化为可售卖的旅游消费产品。这一机制并非简单重复殖民时期的东方主义，而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的文化策略，被东方主义话语长期规训的群体，主动采用东方主义的编码方式来建构自我形象。第三层是地方社群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和记忆的“作为情感载体的东方”即普通市民、食客与游客在亲历这些空间时所产生的具体感受与集体记忆，它既不完全等同于殖民想象，也不完全等同于资本操作，而是一种更为混沌、更为日常的文化经验。

三者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案例中以不同的方式交织运作，需要在具体的空间生产分析中加以区分。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颠覆了将空间视为“容器”或“空无”的哲学传统，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被生产出来的。这一判断的激进性在于：空间既然是被生产的，就必然承载着特定生产方式的逻辑，必然打上权力与资本的双重烙印。由此出发，列斐伏尔建立了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者并非静止并列，而是持续处于张力与互动之中。空间实践指向感知的维度，即建造、维护、停泊、迁移等日常物质性操作；空间表征指向构想的维度，即规划者、资本家和政府通过图纸与话语建构的抽象空间；表征空间指向亲历的维度，即使用者通过象征与想象直接“生活”出来的空间，充满情感、记忆与反抗的潜能。三个维度在水上餐厅案例中清晰交织，一舫之兴衰既是资本与政府的构想与规划（空间表征），也是日常建造、运营与迁移的物质过程（空间实践），更承载着食客、游客与市民的亲身体验与集体记忆（表征空间）。列斐伏尔的关键判断的资本主义的延续不仅依靠商品的生产，更依靠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逻辑塑造了一个同质性、碎片化的抽象空间，抹平地方差异，将一切转化为可交换的景观。水上餐厅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产物。但空间生产具有历史性，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密切关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下的空间生产逻辑各不相同，这正是理解四地六船不同命运的理论入口。

列斐伏尔揭示了“空间如何被生产”，却未能充分回答“为什么是以‘东方’这一特定方式被生产”。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恰在此介入。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揭示：“东方”不是地理事实，而是一套由西方建构的知识—权力体系，通过学术、文学和艺术将多元的“东方”压缩为可被西方认知和支配的刻板符号。水上餐厅的“中国风”建筑正是这一逻辑在消费领域的空间化，飞檐、画舫、龙椅、灯笼脱离了各自具体的历史语境，被重组为一套可供西方凝视消费的“中国性”景观。萨义德将这种空间化的他者建构称为“想象地理”，通过将异域空间纳入西方知识框架来完成认知支配。水上餐厅正是这种想象地理的物质化身：西方游客无需踏上中国土地，即可在避风塘或内港体验微缩的、安全的、可控的“东方”。“东方”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在全球旅游消费中具有最高的可售卖性，已被东方主义话语充分编码，成为最直接的消费入口。

然而，将东方主义框架应用于粤港澳水上餐厅时，需要对其适用范围作限定性调整。在殖民时期的香港与澳门，东方主义确实是空间表征的主导逻辑，水上餐厅的“中国风”建筑首先服务于西方游客的凝视。但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与 1999 年澳门回归之后，随着内地游客成为主要客源，“东方”符号的消费主体发生了根本转移。在内地案例中，东方主义框架的适用性更为有限，龙门海鲜舫与得月舫的“中国风”建筑首先服务于本土消费者的文化自豪感与城市形象建构，而非西方游客的异域想象。因此，本文在使用东方主义概念时，区分三种运作机制：殖民时期的“被动东方化”（西方凝视主导）、后殖民时期的“自我东方化”（华人资本主

动征用符号服务于多元消费主体）、以及内地案例中的“去东方化的东方符号”（符号的种族政治意涵弱化，主要作为城市地标的文化装饰）。

列斐伏尔回答了“空间如何被生产”，萨义德回答了“为何是东方”，但当这些空间消亡之后发生了什么？为何珍宝沉没引发集体哀悼而龙门拆除近乎无声？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在此提供关键解释。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记忆是由社会框架塑造的集体现象，需要物质载体与仪式实践来维持，没有空间锚点的记忆是脆弱且易逝的。水上餐厅正是这样的记忆容器，珍宝不仅是船，更是几代香港人、数十万游客共同投注了情感与记忆的空间。其沉没不仅是物质载体的消逝，更是一整套集体记忆的危机。但哈布瓦赫同样揭示了一种权力不对称：不同空间被不同社会框架承载，具有截然不同的记忆命运。珍宝被全球话语网络深度捕获而成为全球性记忆锚点，得月舫和龙门则主要存在于地方性社会框架中，当它们消亡时，前者引发广泛回响，后者近乎无声。

关于“浮动的东方”这一核心概念，需要在实证、理论与方法操作三个层面加以明确界定。在实证层面，“浮动的东方”指涉一个具体的历史经验对象：1950 年代至 2020 年代间分布于粤港澳水域的仿古画舫式水上餐厅，它们以物理性的水上停泊为存在方式，以“中国风”建筑符号为视觉表征，以海鲜餐饮与博彩娱乐为核心功能。在理论层面“浮动”被赋予三重隐喻意义。物理意义上，这些建筑浮于水面，处于岸与海的边界；文化意义上，它们是混杂空间，既非纯粹的中国传统，亦非纯粹的西方建构，而是两者交锋的杂糅产物；政治意义上，它们浮于资本、国家、市民、游客多种权力之间，各方持续争夺意义的定义权。在方法操作层面，“浮动的东方”通过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加以分析：空间表征层面考察“东方”如何被构想与编码，空间实践层面考察这一构想如何被物质化，表征空间层面考察这一空间如何被体验、记忆与争夺。

将三者整合为一个贯通的分析框架，水上餐厅的完整图景得以呈现：空间表征解释“东方”如何被构想和编码，空间实践解释这一构想如何被物质化，表征空间解释这一空间如何被体验、记忆和争夺。三重维度之间的持续张力，命名与反命名之间、构想与体验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构成了文化政治运作的核心场域。萨义德在其中揭示“东方”方向的选择逻辑，哈布瓦赫赋予分析以历史纵深。这一框架的核心关切是：文化表征如何通过空间生产获得物质形态，又如何在空间变动中瓦解与重构。水上餐厅的历史，从 1950 年代太白海鲜舫的诞生到 2022 年珍宝的沉没，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例证。



图 2：海鲜舫内景图

三、历史谱系：水上餐厅的粤港澳生成史

（一）前史：从紫洞艇、歌堂趸到海鲜舫

在“东方奇观”的空间表征形成之前，中国南方水域已存在水上餐饮的物质形式，但它们被接合的意义截然不同。明末清初的广州珠江上，出现了被称为“紫洞艇”的豪华画舫。据地方文献记载，紫洞艇得名于南海紫洞乡，清初紫洞乡人麦耀千在广西为官，常乘装饰精美的船往来于广州与家乡之间，广州富户纷纷仿制，形成了专门的“紫洞艇”船型。至清中叶，珠江上的紫洞艇已成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这些装饰精美的船只最初为方便官员往返家乡与广州而造，后因造型新奇被富户仿制为宴饮场所。紫洞艇被接合于“文人雅趣”与“炫耀性消费”而非“东方异域”，它尚不具有面向“西方凝视”的展演功能。1920 年代，香港仔避风塘兴起了“歌堂趸”热潮。“歌堂趸”是昔日渔民水上酒家，每当有喜宴、大时大节庆祝时，渔民都会到歌堂趸摆酒。歌堂趸最初只接预约酒席，后来受到经营南北行的商贾欢迎，使海鲜舫生意得以发扬光大。1950 年代全盛时期，一度有十多艘海鲜舫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歌堂趸的意义接合于“蜑民社区实践”，它是特定水上社区内部的社会服务设施，而非对外展示的文化符号。然而，它提供了后来“海鲜舫”的物质形式基础：浮动结构、水上餐饮、宴席功能。从紫洞艇到歌堂趸再到海鲜舫，这一谱系显示水上餐饮空间的意义经历了从“文人雅趣”到“社区服务”再到“国际消

费”的多次转换。每一次转换都不是自然的演进，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空间生产的重新编码。

（二）香港：三舫合一的“珍宝王国”

太白海鲜舫是香港第一艘现代海鲜舫建于 1950 年，由原于中环威灵顿街经营酒楼的商人袁容投资。太白海鲜舫最初为木制登陆艇，1952 年改建为画舫，1960 年扩建至可容纳八百余人。海角皇宫于 1957 年开幕，最初由海角皇宫集团购入一艘名为“渔利泰”的船建成。1980 年代，海角皇宫被珍宝收购。珍宝海鲜舫的诞生则经历了一场灾难。1970 年，商人王老吉集资筹建更大的珍宝海鲜舫。1971 年 10 月 30 日，距离开业前六天，船身因烧焊火花燃着易燃的装修物料而发生四级大火，整艘船严重焚毁，更造成 34 人死亡、42 人受伤。由于王老吉无力重新投资，何鸿燊和郑裕彤于 1972 年买入珍宝海鲜舫业权并重建。何鸿燊与郑裕彤耗资逾 3000 万港元重建，历经四年于 1976 年 10 月正式开业。重建后的珍宝海鲜舫座落香港仔避风塘，采用仿中国宫廷风格设计，长 76 米、宽 22 米、高 28 米，楼高 3 层，面积达 45000 平方英尺，可容纳超过 2300 名宾客。船上设有龙楼凤阁等装饰，仅中国传统手工饰物及壁画就耗资 600 万港元，皇帝龙椅更耗时两年制作。排水量达 3300 吨。海鲜舫的巨型海鲜池养有 60 多种海产，并设有全港最大的紫外线海水消毒系统。其厨房设于一艘独立的趸船上，以架空式跳板桥连接海鲜舫各层。1980 年代，珍宝收购太白海鲜舫及海角皇宫，三舫合一形成“珍宝王国”。从社区服务性质的“歌堂趸”到资本高度集中的“珍宝王国”，香港水上餐厅的空间生产经历了一个从“社区空间”到“消费空间”再到“垄断空间”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驱动力是资本，何鸿燊与郑裕彤的资本注入不仅挽救了一艘船，更重塑了整个香港仔避风塘的空间秩序。



图 3：珍宝海鲜舫、太白海鲜舫、海角皇宫

（三）澳门：从“珠江画舫”到“皇宫娱乐场”

澳门皇宫船的前身是“珠江画舫”，是珠江三角洲最有名气的画舫。20 世纪 60 年代初，画舫已由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租借使用。1962 年 5 月 26 日，在澳门内港 14 号码头开幕，以“皇宫号”为船名，作为旗下娱乐场，招牌则以“澳门皇宫”及“皇宫娱乐场”两个名号作招徕。酒菜部分别于 1962 年 10 月 5 日开业。澳门旅游娱乐于 1995 年正式把珠江画舫购入，并耗资重金加以装饰，令画舫充满中国传统特色，正名为皇宫娱乐场。由于皇宫娱乐场是澳门唯一一艘在船上开设的娱乐场，因而有“赌船”、“贼船”的称号。“贼船”一称的由来，因上船赌两手者多少留下些金钱，故被人谑称为‘贼船’，名传至今。皇宫娱乐场其后迁至 20 号码头继续营业。1999 年 6 月，为配合澳门政府的安排，皇宫娱乐场迁往新口岸新填海区的外港码头侧继续营业。后于 2002 年 11 月，再迁至新八佰伴。2007 年 10 月 25 日早上，皇宫娱乐场暂停营业。澳门皇宫船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空间功能的双重性：它既是餐饮空间，也是博彩空间。“皇宫”的命名指向帝王意象与奢华体验，“娱乐场”则是博彩业的官方委婉语。两种命名之间的张力即帝王宫殿与赌博场所，正是澳门博彩资本的空间表征策略，用“皇宫”的崇高感覆盖“赌场”的负面联想。而 “贼船”这一绰号的流行恰恰揭示了表征空间对空间表征的反抗。

（四）内地：得月舫与龙门海鲜舫的探索

广州龙门海鲜舫于 1985 年 8 月 16 日在大沙头珠江河面正式开业，是广州第一家高级水上食府。据《广州日报》载开业当天“宾客如云，盛况空前”，时任广

州市领导出席剪彩仪式。龙门海鲜舫的选址与开业，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州“搞活经济”政策在水上餐饮领域的具体实践。其经营模式参照了香港海鲜舫的经验，但在定价与服务上更贴近内地消费水平。据当时的菜单显示，一桌海鲜宴的价格约为普通工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使其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先富起来”群体的消费象征。辉煌时期，饮茶食饭热闹非凡，后来由于趸船已超期服役，不得不拆除报废。龙门海鲜舫的拆除过程几乎未在公众层面引发任何波澜，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媒体专题回顾，甚至连具体的拆除日期在公开资料中都难以查证。这种“静音式退出”本身即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空间政治现象。

珠海得月舫的前身“江南海鲜舫”于 1993 年经珠海市政府批准立项，香洲区渔民办事处在野狸岛填海建造。完成主体四层建筑后，因资金问题短暂烂尾。2000 年 1 月 20 日，香湾办与瀚华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将海鲜舫用地及地上建筑物以 2630 万元转让给瀚华公司。得月舫继续建到五层。2003 年 7 月 16 日，瀚华公司将江南海鲜舫出租给珠海市吉大得月楼饮食有限公司经营，更名为“得月舫”。2004 年 1 月 12 日正式开业。得月舫设有宫廷风格包厢及海景观景位，提供早茶、正餐等餐饮服务。据珠海本地媒体报道，得月舫在 2005 至 2010 年间年均接待食客约 15 万人次，是珠海情侣路沿线最具辨识度的餐饮地标之一。2014 年，因海燕桥对机动车辆禁行，得月舫曾短暂停业。2020 年宣告停业。据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公告，得月舫因“城市更新需要”被纳入改造计划，拟投资 2 亿元进行活化。

内地案例与港澳案例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龙门海鲜舫和得月舫虽然同样采用“中国风”建筑符号，但它们嵌入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营与地方地标建设的政治经济逻辑，而非殖民旅游资本或博彩资本的逻辑。这意味着，东方主义框架对内地案例的适用性需要限定，内地案例中的“中国风”建筑首先服务于本土消费者的文化认同与城市形象建构，其“东方性”的种族政治意涵相对弱化，更多表现为一种“去东方化的东方符号”，符号的异域想象功能减弱，地标装饰功能增强。广州龙门海鲜舫的“雕梁画栋”服务于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民对“现代化中国”的想象，它既不是对西方的模仿，也不是对西方的抵抗，而是对中国也可以有高级水上餐厅的自我证明。珠海得月舫的“宫廷风格”则服务于珠海经济特区对“文化深度”的追求，作为一个新兴窗口城市，珠海需要可辨识的文化地标来增强城市认同。两种内地案例中的“中国风”符号，其功能更接近于“城市名片”而非“异域景观”。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内地的水上餐厅在完成其“城市地标”的象征功能后，因制度性条件（趸船超期服役、交通管制、城市建设原因）的变化而退出历史舞台，其退出几乎未被公众注意。

四、空间的生产：三重维度的辩证分析

（一）空间表征：“东方”的构想与编码

空间表征是规划者、资本与政府通过图纸、规划与话语建构的抽象空间。水上餐厅的“东方性”首先在这一层面被生产出来，这是一套系统的符号操作与意义赋予过程。

命名构成空间表征最为基础的运作。通过命名，物质实体被纳入特定的意义链条。“太白”取自太白金星，指向超凡脱俗；“珍宝”指向珍贵与奢华；“海角皇宫”兼有地理意象与帝国意象；“皇宫”指向帝王体验；“得月”取自“近水楼台先得月”，接合于古典诗意。这些命名共享“高贵、古典、奢华”的意义链条，将商业空间提升为文化符号，将消费行为转化为象征交换。命名履行了双重功能：为空间赋予可辨识的身份标记，为消费者提供想象性的主体位置，当食客走进“珍宝王国”，他便不再是一个普通用餐者，而是这个微型“王国”的临时成员。这种主体位置的询唤正是空间表征的深层效力。然而，命名的权力从来不是单向的。澳门皇宫船被戏称为“贼船”，构成了一种经典的反命名实践。“贼船”一词有其历史渊源，清末民初一些赌商因得不到官授赌牌，利用花舫在珠江上聚赌，民间称之为“贼船”。澳门皇宫作为浮动赌场的当代形态重演了这一历史结构，以“贼”的道德否定意味解构了“皇宫”的高贵想象。命名与反命名的对峙不是语言游戏，而是关于空间意义的权力斗争。

建筑符号的编码构成第二重操作。水上餐厅的“中国风”建筑并非对传统的忠实复原，而是为满足特定凝视而设计的视觉编码系统。珍宝的“仿中国宫廷风格”、澳门皇宫的“中国传统特色”、得月舫的“宫廷风格包厢”，共同构成了一套可识别的“中国性”视觉语法。这些描述中反复出现的“宫廷”“传统”“古色”等语词，暴露了这套视觉编码的核心机制，它不是在还原任何一种具体的中国建筑传统，而是在生产一个抽象的、可被快速辨识的“中国性”标签。这些建筑符号构成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没有可追溯的原始参照物，而是“东方”这一概念的自我指涉式再生产。这正是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逻辑在空间中的具体化：东方不是东方的自我描述，而是西方为自身目的建构的他者。

影像的空间表征构成第三重操作。电影不仅“记录”空间，更“生产”空间。1974 年 007 系列电影《铁金刚大战金枪客》在澳门皇宫船取景，将其编码为“东方异域”“神秘”“危险”“诱惑”服务于西方观众的猎奇凝视。1996 年的《食神》则在珍宝王国取景，将画舫从“异域”重新编码为“本土”香港人自己的故事空间。同一物理空间在多种影像中被生产为不同的空间表征。前者是“被观看的东方”，后者是“自我叙述的香港”。这一转变发生在香港回归前夕，折射了香港社会文化认同的深刻转型。



图 4：电影食神剧照

（二）空间实践：停泊、迁移与日常运营

空间实践将“构想”的东方“落地”为物质现实。建造、停泊、维护、迁移使“东方”从图纸和影像中走出，成为可进入、可消费的物理空间。

停泊决定船在哪、属于谁、服务于谁。香港仔避风塘从渔港变为“珍宝王国”的停泊地，1978 年因填海工程迁至深湾现址，避风塘的实用功能被画舫的观赏功能逐步覆盖。澳门内港 14 号码头是皇宫船的初始停泊点，港澳码头所在地，香港游客甫落船即可登船，被嵌入“澳门第一印象”的空间秩序。珠海野狸岛是得月舫的停泊地，一个填海造地的人工岛，船与陆地均为“人造”，自然与人工的边界变得模糊。列斐伏尔提醒，空间实践承载着社会关系的物质化，停泊点的选择是城市权力话语的空间表达。

迁移构成空间实践的重大变动。澳门皇宫从内港到外港到筷子基的迁移轨迹，记录了澳门从“内港时代”到“赌场时代”的城市空间转型。海角皇宫从香港售往菲律宾、再赠予青岛，脱离原初空间生态后未能嵌入新的空间实践闲置至今，半岛新闻 2022 年 6 月实地探访报道：“四层的海角皇宫仍然停靠在海边，上船的通道被封闭，船体生锈，门窗玻璃大多已经破损，船上堆满了各种垃圾。”物质遗存必须被嵌入特定的空间实践才能“活着”。珍宝的南海沉没则是空间实践的终极消解。2020 年因疫情停业，海事牌照于 2022 年 6 月到期，香港没有泊位、保养费用高昂，船东决定将其移离香港，迁移途中沉没。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依赖持续的实

践来维持，当空间实践停止，空间表征失去物质载体，表征空间便瓦解为怀旧。珍宝沉没引发的意义爆炸，哀悼、怀旧、阴谋论正是一个被持续生产了半个世纪的空间突然终结时释放出的巨大象征能量。空间实践依赖制度性条件的支撑。海事牌照、餐饮许可、博彩执照使空间得以合法运作。2007 年澳门皇宫因牌照到期停业；2022 年珍宝因牌照到期被拖离香港。制度既是空间实践的条件，也是其限制。

（三）表征空间：体验、记忆与意义争夺

表征空间是使用者“活出来”的空间，游客的体验、市民的记忆、公众的哀悼构成“亲历空间”的“东方”。它始终保留着反抗的潜能。游客的“东方”体验是被引导的。珍宝的霓虹灯、仿古装饰、海鲜盛宴构成完整的感官程序，累计访客逾 3000 万，包括英女皇等中外名人。这些体验看似自由，实则是空间表征通过空间实践在表征空间中的实现，游客以为自己自主体验“东方”，实际是在重复资本写好的脚本。然而，表征空间总有反抗的潜力。“贼船”是表征空间对空间表征的反叛。“人离乡贱，船离港沉”将沉船从技术事故重新编码为文化创伤，提供了一种宿命论色彩的民间哲学。它将沉没归因于“离乡”，暗示船与香港之间存在近乎血缘的归属关系，一旦切断便灾难降临既是对资本决定的隐秘批评，也是对资本无根流动的民间抗议。

集体记忆的空间锚点构成表征空间的重要维度。珍宝沉没后，有评论称其“变成了香港人的铁达尼号”。铁达尼号隐喻之所以有效，是将珍宝从“餐厅”重新编码为“记忆的容器”，沉没的不是一艘船而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哈布瓦赫指出记忆需要社会框架来维持，不同框架产生不同的记忆命运。珍宝被全球话语网络深度捕获，国际旅游叙事、电影影像、名人见证、资本话语为其集体记忆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框架，沉没时这些网络同时被震动。而得月舫与龙门从未被全球话语网络捕获，退出时近乎无声。这揭示了表征空间运作中的根本权力不对称，空间记忆的可传达性取决于能否被纳入具有全球传播力的话语网络。



图 5：海鲜舫内景图

（四）三重维度的辩证关系

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的张力体现在构想与执行的落差上。资本构想的“东方奇观”需要依靠空间实践来实现，但遭遇制度性障碍或物质性限制时，空间表征便失去物质支撑。珍宝的沉没正是这一张力的极端体现，“世界最大海上食府”的想象与缺乏维护的物质状态之间的裂痕导致了物质崩溃。空间实践与表征空间的张力体现在使用与反抗的关系上。日常运营塑造游客和市民的体验，但表征空间并不完全服从于空间实践。“贼船”绰号和“人离乡贱”格言表明使用者可以通过表征空间对既有空间实践进行批判和反抗。表征空间与空间表征的张力体现在体验与构想的错位上。资本试图通过命名和建筑符号固定“东方”的意义，但游客的体验和市民的记忆总是溢出这些固定框架。同一艘船在 007 中被编码为“异域东方”，在《食神》中被编码为“本土香港”，说明空间表征本身也是多元和流动的。三重张力表明，空间的生产永不完结，任何意义都只是暂时的接合，空间的意义永远在浮动、漂移、重新分配。



图 6：珠海得月舫

五、社会文化反思：记忆、遗产与“东方”的再生产

粤港澳六艘水上餐厅的物质命运差异显著。珍宝沉没南海；太白复业中；海角皇宫闲置青岛，船体锈蚀；澳门皇宫停泊筷子基北湾，计划改造为博彩文化博物馆；得月舫拟投资改造；龙门已拆除。就空间表征而言，珍宝被全球话语网络深度捕获，其“东方”表征获得全球性传播力；而得月舫与龙门则主要存在于地方性话语中。就空间实践而论，珍宝的沉没源于空间实践的骤然中断；海角皇宫的闲置源于空间实践脱离原初社会关系；澳门皇宫的待活化悬置于过渡状态；得月舫与龙门的拆除是空间实践的永久终结。就表征空间而言，珍宝沉没触发意义爆炸，海角皇宫的表征空间陷入公众失语，得月舫与龙门的表征空间则是正在消散的地方性记忆。

不同命运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是资本逻辑与制度语境的差异。珍宝嵌入国际旅游资本与殖民暨后殖民城市语境；皇宫嵌入博彩特许资本与赌城发展语境；得月舫与龙门嵌入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经营与地方地标建设逻辑。三种资本逻辑的共同之处在于：水上餐厅均被工具化为“东方”景观的生产装置，而非自主的文化空间。这正是萨义德东方主义批判的核心洞见，这些空间从诞生之初便被置于为他者凝视而存在的工具性位置，当工具性价值消减，空间便被资本逻辑与制度框架抛弃。这一工具性命运在“遗产化”的话语争夺中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澳门皇宫的“博彩文化博物馆”方案是一次空间表征的重写实验，试图将“赌场”重新编码为

“博物馆”。然而，这一重写面临结构性困境：博彩与博物馆在公共话语中分属不同意义领域，有评论指出该方案将与现有“澳门博彩业历史资料馆”形成重复，揭示了遗产化操作的深层矛盾。当一种空间功能在道德上存在争议时，“博物馆化”究竟是诚实的记录还是巧妙的洗白？太白海鲜舫的复业则是另一种话语策略，通过恢复空间实践来维持表征空间的连续性。这两种策略面临共同困境，遗产化并非对空间的被动保存，而是一套由专家话语、行政程序与市场逻辑共同运作的意义重构机制。批判性遗产研究主张重新思考“权威遗产话语”的实践与观念，它通过一套隐蔽的遴选标准决定什么值得保存，其背后是特定阶层、特定知识体系与特定政治逻辑的权力运作。珍宝因其全球知名度被反复讨论，澳门皇宮因其与博彩资本的历史关联被纳入活化计划，而得月舫与龙门则因其“地方性”与“非正式性”被排除在主流遗产话语之外。遗产并非静态实体，而是由制度、知识与记忆协商而成的动态社会过程。



图 7：第一艘“澳门皇宮”（1962 年）

澳门皇宮的“博物馆化”方案并非其唯一的“遗产化”路径。事实上，在路凼城的澳门葡京人综合度假村内，另一座“澳门皇宮”已于 2021 年正式开业。它并非历史原物，原船至今仍停泊于筷子基北湾，等待不知何时才能完成的活化，而是一座固定于地面的仿船形建筑，内部经营“皇宮海鲜舫”餐厅。这座当代“复制品”几乎以“一比一”的比例重现了昔日澳门皇宮船的外观，其设计宗旨被表述为“重塑澳门人的集体回忆”。这一案例为本文的遗产化讨论增添了新的维度，它不再是关于“如何保存原物”的争论，而是关于“用仿像取代原物”的文化操作。在原物尚未获

得任何实质性活化方案的情况下，一个精致的、安全的、面向当代消费市场的“复制品”已经先一步占据了“澳门皇宫”的文化位置。游客在路凼城的陆地上就餐，体验的是一个被精心清洁过的“怀旧”，它剥离了“贼船”所携带的博彩风险、资本掠夺与民间记忆，将“皇宫”的符号纯粹化为可供打卡的“中国风”视觉景观。原物的复杂历史，它的漂泊、它的争议、它的衰落，在仿像中被过滤掉了。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审视，这构成了一个“拟像打败原物”的案例。鲍德里亚曾指出，在当代条件下，复制品可以比原物更“真实”，因为它更完美、更可控、更符合消费者的期待。葡京人的“澳门皇宫”正是如此，它不像原船那样受制于海事牌照、船体维护、城市空间博弈等制度性约束；它不需要面对“浮动赌场”的历史争议；它也不需要解决“如何将博彩记忆转化为文化遗产”的伦理困境。它只是一座餐厅，一座造型别致的、可供拍照的餐厅。这种“简化”恰恰是其商业成功的前提。然而，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来看，这种简化也意味着意义的丧失。当“澳门皇宫”被还原为一个纯粹的消费符号时，它所承载的那段关于浮动赌场、民间“贼船”记忆、城市空间变迁的复杂历史，便被有效地“去历史化”了。原船与仿像的并置，还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遗产政治问题：当一个城市有能力在地面上重建一座“更完美的复制品”时，它是否还有动力去保存那个正在腐朽的、难以管理的原物？在路凼城的精致仿像面前，漂泊于筷子基的“真身”显得更加边缘、更加尴尬。如果仿像已经完美地承担了“集体记忆”的文化功能，或者说它已经成功地让公众相信“这就是记忆中的那个皇宫”。那么原物的活化便从一个“文化必需”降格为一个“成本考量”。这正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表征命运的一个缩影：谁更“真实”并不取决于谁更接近历史原物，而取决于谁更有效地占据了文化表征的流通网络。

“非正式遗产”的身份使其既无法被纳入既有保护框架，也无法被彻底遗忘。所有被列入名录的遗产都曾是非正式遗产，但并非所有边缘状态都能获得被命名的机会。那些被全球话语网络充分捕获的空间，其消亡成为“事件”；那些仅存在于地方性网络中的空间，其消亡沦为近乎“静音”。这是东方主义知识权力体系在空间维度上的具体运作。“博物馆化”的困境在于：将空间冻结为博物馆展品，其“浮动”的核心特质将被彻底抹除，为了保存而不得不消解所保存之物的灵魂。有研究指出，制度化保护虽强化了文化遗产的物质保存，却导致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的脱节。



图 8：新澳门皇宫餐厅

从记忆理论审视，水上餐厅的命运揭示了集体记忆与物质空间的脆弱关系。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需要社会框架来维持，诺拉在此基础上提出“记忆之场”概念，揭示了现代社会不再生活于记忆自然栖居的环境中，而是需要刻意“制造”记忆场所。珍宝沉没后，人们只能用影像、文字与仪式来“纪念”，记忆脱离了空间成为纯粹的符号。将珍宝沉没比作《铁达尼号》的评论，将其提升至文化创伤层面，铁达尼号凝聚了一个时代关于技术、阶级与命运的全部焦虑，珍宝的沉没则凝聚了后殖民香港关于身份、记忆与消逝的集体无意识。得月舫与龙门的退出近乎无声，是因为其记忆局限于地方社群，缺乏向更广阔公共领域投射的制度性通道。记忆的政治受制于话语权力的分配与资本逻辑的过滤。“浮动”因此不仅是一个物理描述，更是一重具有理论穿透力的隐喻。物理意义上，它们浮于水面，处于岸与海的边界。文化意义上，它们是混杂空间，既非纯粹的中国传统——仿古建筑是拼贴而非复原，亦非纯粹的西方建构，而是两者交锋的杂糅产物。政治意

义上，它们浮于资本、国家、市民、游客多种权力之间，各方持续争夺意义定义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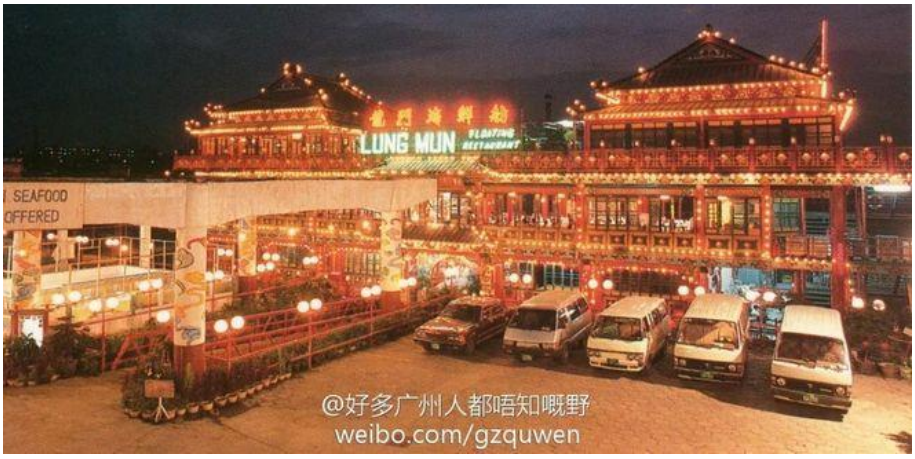

图 9：广州龙门海鲜坊

东方主义在当代的运作方式已发生深刻转型。当代东方主义不再依赖单个作者或文本的权威，而是嵌入一套由全球旅游产业、国际媒体网络、电影工业与资本流动共同构成的话语装置之中。珍宝的“东方”表征之所以具有全球性传播力，并非因其比得月舫“更真实”，而是因被更有效地嵌入这套全球性话语装置。其沉没成为“事件”，同样是因为这套话语装置在物质载体突然消失后释放出巨大的象征能量。水上餐厅的兴衰史可以理解为一套话语装置的完整生命周期：从“东方”表征的生成到空间实践的持续再生产，再到记忆的锚定与意义的争夺，直至最终的沉没、闲置或拆除。

然而，“再生产”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重复。珍宝沉没后，围绕其意义的争夺并未因物质载体的消失而终止，反而以更激烈的方式展开，有人视之为“香港文化的损失”，有人解读为“资本逻辑的冷酷”，有人读出“后殖民处境的隐喻”。这些相互竞争的意义阐释本身就是“东方”再生产的最新形式：物质沉没但表征仍在运作，船体消失但意义仍在增殖。水上餐厅的遗产化困境最终指向一个根本的文化政治问题：哪些空间能够被记住、以何种方式被记住、被谁记住，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选择，而是权力斗争的永恒场所。“东方”的再生产正是在这一权力斗争的缝隙与张力中持续进行。它永远不会终结，因为意义的生产永无止境；它也永远无法被最终固定，因为“浮动”正是其存在的基本方式。

六、结论：浮动的空间，漂移的“东方”

粤港澳水上餐厅的兴衰，远非一艘艘商业船只的命运沉浮所能概括。在更抽象的理论层面上，这一案例群揭示了一个贯穿现代性进程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当文化表征以空间为物质载体时，它的存续便不再取决于符号系统自身的生命力，而是取决于支撑其存在的空间生产装置能否持续运作。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装置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构成，即符号层面的意义赋予、物质层面的日常运营与定位、以及使用者层面的体验与记忆。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决定了文化表征的命运。当三者形成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时，表征获得持续再生产的动力；当三者之间的张力过大或某一环节断裂时，表征便面临危机。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命题，文化表征的物质性命运，取决于其空间生产装置的耦合强度与再生产能力的持续运作。珍宝的沉没并非一次偶然的海难，而是这一装置的系统性崩溃。在空间表征层面，“世界最大海上食府”的东方想象仍然有效，甚至因为沉没而获得了更强的象征能量；但空间实践层面，即维护、运营与迁移，已无法支撑这一想象的物质存续。表征空间层面，集体哀悼成为装置崩溃后剩余能量的释放形式。三者之间的断裂是根本性的。海角皇宫的命运则呈现为另一种模式。它的空间表征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青岛后未能与新的空间实践形成有效耦合，因此陷入长期的悬置状态。得月舫与龙门的退出则是第三种模式。它们从未被纳入全球性的话语网络，其空间生产装置从一开始就是地方性的、弱耦合的，因此退出时释放的象征能量极为有限，近乎静音。这三种命运类型的并置表明，文化表征的物质存续并非一个静态的存在状态，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持续运作、持续耦合的动态过程。一旦这一过程中断，无论符号系统多么精美、历史记忆多么深厚，文化表征都将面临物质层面的消解。这一发现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从一种社会分析的工具提升为一种关乎文化存有论的追问。列斐伏尔揭示了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却未能充分追问当社会关系本身进入流动状态，当资本与话语以全球化的规模重新配置空间生产的条件时，空间存续的根基究竟何在？水上餐厅的案例表明，空间的存有论地位并非如海德格尔所言的“定居”那般源自一种先在的归属，而是在资本与话语的双重支配下被持续生产与反复消解的临时状态。换言之，空间不再是人“寓居”于其中的存在论根基，而成为资本与话语争夺的“领地”与“战场”。这一判断将空间生产的讨论从社会批判的层面提升至文化存有论的层面，也提示我们重新审视“居”与“游”、“定居”与“漂泊”在当代文化表征中的位置。水上餐厅的“浮动”之所以具有理论穿透力，正是因为它同时回应了海德格尔关于“筑居”的追问与德里达关于“漂流”的解构。它们既不真正“居”于某一处，也不全然“游”于无根中，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临界状态，这种临界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存有论意义上的“居间”形态。

由此可引出另一重理论维度，即空间生产装置的时间性问题。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侧重于空间与其社会条件的共时性关联，但在水上餐厅案例中，空间生产

装置的时间结构同样值得考察。这一装置的生命周期从符号编码到物质运营再到记忆沉淀，并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稳态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不可逆断裂的时间性进程。珍宝沉没之后，再没有任何“修旧如旧”或“原址重建”能够恢复其物质存在；得月舫拆除之后，它的物质空间便永远地退出了公共生活。这种不可逆性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空间生产装置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空间化，也是时间的空间化。每一次空间实践的终止，都是一次社会时间的断裂。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已经暗示了这一点，现代社会的“记忆之场”之所以取代了“记忆环境”，正是因为物质空间的断裂迫使人们用符号来补救已逝的亲身经验。水上餐厅的命运将这一判断推向了更极端的形式：当空间实践终止之后，残留的并非“记忆之场”所暗示的那种可被符号化保存的记忆某种纪念碑式的存在，而是一整套无法被符号化的“残余”。哀悼并非纪念，因为纪念假定被纪念之物已经以符号形式获得了替代性存续，而哀悼所揭示的则是这种替代的不可能性，沉没的船体无法被任何影像、任何文字、任何博物馆化的展品所“替代”。船体沉没的物质性事实构成了一种不可还原的“剩余”，它拒绝被符号完全吸纳，也拒绝了“记忆之场”所承诺的那种符号替代的可能性。这一发现提示我们重新审视记忆与空间的关系，记忆固然可以借助文本、影像、仪式来传递，但当它失去了原初的空间锚点，便不可避免地面临“去物质化”的危机，而这种去物质化并非简单的“遗忘”，而是一种比遗忘更为彻底的“不可被替代”。

从这一分析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空间生产装置的运作与断裂。本文的分析指向一个核心机制，即话语权力与资本逻辑的双重支配。水上餐厅的“东方性”之所以被选中、被编码、被反复生产，是因为它符合全球旅游消费市场对“东方”的可售卖想象。资本逻辑将“中国风”建筑符号征用、标准化、嵌入全球流通网络，使其成为可被快速辨识和消费的标签。而话语权力则在更深的层面上运作，它决定了哪些空间能够被看见、被命名、被记住。珍宝之所以成为全球性事件，得月舫之所以近乎无声，并非因为前者承载了更多“真实的文化价值”，而是因为前者被嵌入了具有全球传播力的话语网络，后者则被结构性排除在这一网络之外。这一差异揭示了文化价值认定背后的权力结构。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文化表征能否获得可见性与记忆资格，取决于它是否被有效编入了全球性的话语生产装置。文化表征的命运因此不是其内在价值的自然流露，而是一套复杂的筛选与排除机制的运作结果。这套机制以资本利润为动力、以话语权力为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系统性地决定什么值得被看见、什么值得被记住。然而，“话语权力与资本逻辑的双重支配”这一判断不应被误读为一种简单的决定论。水上餐厅的案例同时揭示了抵抗的可能与限度。表征空间对空间表征的反抗，“贼船”的反命名、“人离乡贱”的民间格言，表明话语权力从来无法实现完全的覆盖与控制。但这些抵抗又始终是局部的、有限的、难以突破结构性边缘化的。得月舫的近乎“静音”便是这种结构性边缘化的极端形式，它并非没有地方性的抵抗与哀悼，而是这些抵抗与哀悼缺乏向全球层面投射的制度性通道。这一发现为文化研究的抵抗命题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修正：抵抗的可能性固然存在，但其效力与可见性取

决于能否被纳入具有传播力的空间生产装置之中。换言之，抵抗并非一种纯粹的外部力量，它本身就受制于它所试图抵抗的话语权力结构。这一判断既避免了将抵抗浪漫化的倾向，也避免了将支配绝对化的决定论陷阱，为理解文化政治中“支配”与“抵抗”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具理论弹性的分析框架。

在资本逻辑与话语权力的双重支配下，文化表征是否可能获得任何稳定的存在形态？本文的答案是否定的。“浮动”不仅是水上餐厅的物理处境，更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政治状态。这些建筑在物理意义上浮于水面，处于岸与海的边界，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完全属于海洋。在文化意义上，它们是混杂空间，既非纯粹的中国传统，仿古建筑是拼贴而非复原亦非纯粹的西方建构，而是两者交锋与杂糅的产物。在政治意义上，它们浮于资本、国家、市民、游客多种权力之间，各方持续争夺意义的定义权，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一固定。三重意义上的“浮动”指向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判断。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文化表征一旦进入全球流通领域，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永不停息的意义争夺之中。资本试图将其转化为可消费的符号，国家试图将其纳入认同建构的叙事，地方社群试图在其中寄托情感与记忆，游客则按照已经被编码的脚本消费其“异域风情”。这些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最终结局，因为任何一方的胜利都只是暂时的、局部性的。由此可以认为，文化表征的物质化与去物质化，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这一过程就是空间生产的持续运作与不断断裂。当空间生产装置有效运行时，表征获得物质形态，成为可进入、可消费、可记忆的实体空间。当装置因制度性条件变化、资本撤出、话语网络重组而断裂时，表征便面临去物质化的危机。它可能沉没、闲置、拆除，或者被冻结为博物馆化的展品而丧失其“浮动”的生命力。所谓“东方”的再生产，既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复制来完成，也不可能通过博物馆化的冻结来保存，而只能在空间生产条件的持续变动中不断重新协商、重新编码、重新定位。这一判断对于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命运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不仅是水上餐厅，任何进入全球流通领域的文化形式都面临着同样的结构性处境。它的存续依赖于一整套复杂的空间生产装置，而这一装置本身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受制于资本逻辑与话语权力双重支配的。

进一步而言，这一判断指向一个更具理论前沿性的问题：在虚拟体验日益取代物理空间消费的时代，空间生产装置本身是否正在经历一种根本性的转型？水上餐厅的物质终结与数字化“复活”之间的张力，珍宝沉没后大量影像、短视频、网络讨论的意义增殖，恰好预示了这一转型的方向。当空间不再需要物理载体，当记忆可以完全数字化而无须空间锚点时“东方”的再生产将遵循怎样的逻辑？本文的案例分析揭示了一条可能的线索：物质消亡之后的意义增殖并不是“记忆之场”的建立，而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幽灵化”船体沉没之后，关于船的记忆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力。这意味着，空间生产装置的生命周期在数位时代可能发生逆转，不再是从物质到符号的过渡，从建造到运营再到记忆沉淀，而是从物质消亡直接触发符号爆炸。这一逆转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去物质化”本身成为意义再生产的强大动力时，空间生产的物质性基础是否还是其必

然前提？水上餐厅的幽灵化存在，沉没之后仍被持续讨论、图像化、情感投注表明空间生产的模式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而这一转型的方向与后果，仍有待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太白海鲜舫的复业计划、澳门皇宫的博物馆化方案、得月舫的改造，都试图在新的制度条件与话语语境中重新组装这一装置。但这些努力能否成功，不取决于其文化诚意，而取决于能否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空间表征、空间实践与表征空间之间的有效耦合。而在一个虚拟体验日益取代物理空间消费的时代，这一重建面临着更为根本的挑战。当空间不再需要物理载体，当记忆可以完全数字化而无须空间锚点时，“东方”的再生产将遵循怎样的逻辑？水上餐厅的终局不仅是这些建筑的宿命，更是现代性条件下文化表征普遍处境的缩影。它们永远在漂移，永远在被争夺，永远无法被最终固定。而本文所揭示的空间生产装置的运作逻辑，或许正是理解这一永恒漂移状态的一条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列斐伏尔（2021）。《空间的生产》（王昭民译）。商务印书馆。
萨义德（1999）。《东方主义》（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一兵（2025）。社会空间实践与空间表像和表征——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1）。
Ashworth, G. J., Graham, B., & Tunbridge, J. E. (2007). *Pluralising pasts: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Pluto Press.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Harrison, R. (2013).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Harvey, 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Routledge.
Soja, E.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Verso.